

汉文帝与历史上的“德治仁政”

■ 陈斯风

近日,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被确定汉文帝霸陵,并展开挖掘。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,汉文帝陵墓,在建造方式上一定程度节省了劳动力,陪葬品也不及其母亲薄太后陵的规格,与历史上汉文帝生前勤俭、死后“薄葬”的说法比较吻合。

中国古代以农立国,政治的好坏、社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,因而“德治仁政”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标。《尚书·尧典》称:“克明俊德以柔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。”最早提出了“德治”的观念。《论语·为政》则对“德治”做了进一步阐释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孟子在此基础上把“德治”的核心归结为一个“仁”字,“尧舜之道,不以仁政,不能平治天下”,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,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”,因之主张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

尽管儒家的“德治仁政”观念流传了两千余年,从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来看,也仅有汉文帝时期尚有些影子,其余时期只不过是美好的理想蓝图而已。

严于律己的汉文帝

西汉孝文皇帝,名恒,在刘邦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。公元前180年,周勃、陈平等平定诸吕后,他被拥立为汉朝第三任君主。文帝之文为谥号,据《汉书》注引应劭的说法,“慈惠爱民曰文”。汉文帝的统治是汉初历史的转折点。高祖刘邦马上夺天下,惠帝、吕后无为因循,经汉文帝二十三年的治理,统一的西汉王朝才真正走上承平之途,初步实现了政治稳定、百姓安宁、经济发展的天下大治,所谓“文景之治”即由此开端。

中国古代的“德治仁政”,首先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品行修养。按传统标准衡量汉文帝,其道物品行还是比较高尚的。

一是具有谦逊承让的君子之风。汉文帝刘恒本被封于人烟稀少、自然条件恶劣的代地,并无意于君位,因“贤圣仁孝,闻于天下”而被历史大潮推到了政治前台。那些诛灭诸吕的功臣勋将之所以选择刘恒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道德的原因。史载,刘恒在即位前,曾再三推辞,做皇帝实不得已而为之,具有谦让之美德。此既符合古之仁君礼仪,又最终勇于承担天下、宗庙之重托,其举动美妙得体。

二是为使天下重现尧舜遗风,刘恒在即皇帝位后,又不愿“蚤建太子”。他认为,“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

焉,而曰豫建太子,是重吾不德也,谓天下何?”他还说:“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,多义者,若举有德以陪贤及有德朕之不能终,是社稷之灵,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选举焉,而曰必子,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,而专于子。非所以忧天下也,朕甚不取也。”这种以天下社稷为重,而不私于己、不贪恋君位的操守,颇有尧舜遗风。

三是严于律己,以身作则。汉文帝对自己约束破严,每遇天灾或异常天象,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不委过他人,正如他在遗诏中所说:“朕既不敏,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。维年之长久,惧于不终。”汉文帝以节俭倡导天下,史载:“孝文帝从代来,即位二十三年,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,有不便,辄弛以利民。”他罢作露台,不仅自己“衣绌衣”,而且“所幸慎夫人,令衣不得曳地,帟帐不得文绣,以示敦朴,为天下先。”用自己的言行表率群臣,为天下效法。

以民为本的汉文帝

汉文帝的“德治仁政”还体现在敬天、保民上。在汉代人的观念中,天人相关互动,天意反映了民心民情,故敬天与保民本质上是一致的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有载,汉文帝二年(前178年)十一月日食,文帝下诏云:“朕闻之,天生民,为之置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,布政不均,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”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。

第一,重农,劝农。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汉文帝倡农劝农的诏书和籍田亲耕的记载。如即位之初的前元二年,汉文帝曾先后两次下诏劝农:“夫农,天下之本也,其开籍田,朕亲率耕。”“农,天下之大本也,民所恃以生也,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,故生不遂,朕忧其然,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。”十二年(前168年)又下诏云:“道民之路,在于务本……孝悌,天下之大顺也;力田,为生之本也。”在诏书中,汉文帝把力田与孝悌并列,分别予以奖赏。十三年(前167年),史籍又有文帝亲耕的记载:“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,皇后亲桑以奉祭服,其具礼仪。”除此之外,汉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、鼓励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。汉文帝十二年,“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”,即通常所说的田租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;同年,还接受了晁错“纳粟拜爵”



汉文帝亲侍母病



汉文帝霸陵目前出土的文物主要以陶器为主,几乎没有青铜器或其他名贵金银玉器,这证实了文帝生前节葬的要求,与西汉其他帝王陵相比,霸陵也是唯一没有封土的,这也体现了文帝对民力的爱惜。图为出土的铁釜及陶罐

的建议,以达到“主用足、民赋少、劝农工”的目的,保障了国家的财源;十三年,下诏令免田租。为了使流民安于生产,算赋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,丁男徭役减为“三年而一事”。这些措施不仅刺激了农业生产,也使商业活跃起来,尤其是文帝十二年取消了过关卡用凭证“传”的制度后,更是方便了行旅往来和商品流通,使天下之民咸感宽慰。

第二,宽减刑罚,善待臣民。对人的生命和身体的重视也当是“德治仁政”中的应有之义。汉文帝即位不久便“尽除收孥相坐律令”,随后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。汉文帝十四年(前166年),废除了肉刑。人有罪过首先当施教,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,无效而后加刑。作为统治者,要对臣民有着良好的期待,即便偶有罪过亦不当例外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文帝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,甚至出现了“刑罚大者,至于断狱四百,有刑错之风”。

第三,为社稷安,为万民利,

慎武睦边。汉初,北方匈奴屡屡寇边,文帝时往往采取被动应付,消极抵抗的策略。此举并非完全是软弱或力有不逮,而是其“德治仁政”的一个方面。文帝后元二年(前162年)六月与匈奴和亲的诏书中云:“朕既不明,不能远德,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。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,封圻之内勤劳不处,二者之咎,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。间者累年,匈奴并暴边境,多杀吏民,边臣兵吏不能谕其内志,以重吾不德。夫久结连兵,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?今朕夙兴夜寐,勤劳天下,忧苦万民,为之惻怛不安,未尝一日忘于心,故遣使者冠盖相望,结轶于道,以谕朕志于单于。今单于反古之道,计社稷之安,便万民之利,新与朕俱弃细过,偕之大道,结兄弟之义,以全天元元之民。和亲以定,始于今年。”细析此三百余字诏书,有四层意思:其一,把匈奴为害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“德薄”;其二,说明匈奴祸害的严重性;其

三,表达了汉文帝的不安,并不断为解决此难题而进行努力;其四,称赞单于明智,终成和亲,并指出和亲意义深远。在此反映出汉文帝为“全天下元元之民”的胸襟,更进一步表达了其“德治仁政”所内含的民本主义主题。

第四,关怀照顾社会弱势群体。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指出:“方春和时,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,而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陷于死亡,而莫之省忧,为民父母将何如?”要求有关政府部门“其议所以振贷之”。汉文帝十三年六月又一次下诏:“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。”“德治仁政”不是仅对社会的某一部分的,尤其不能以势利计。其面对全社会特别应惠及其中的弱势群体,这也为是否真正实施“德治仁政”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最后,汉文帝提倡孝悌、亲亲、尊尊,使“德治仁政”充满了人情味。中国古代视家国为一体,家是国的基础,国是家的扩张,治国如治家,家睦才能国治,对于一国之君尤其如此。汉朝以仁孝为标榜,文帝更是身体力行,大力提倡。汉文帝本人似乎扮演者汉帝国的君主和刘氏家族的宗主的双重角色,除给予刘氏宗室特殊的关怀外,还从家扩大到国乃至天下。《史记》有两条记载颇堪玩味:一是“群臣如张武等,受赂遗金钱,觉,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,以愧其心,弗下吏”;二是“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,然上诏贵尉佗兄弟,以德报之,佗遂去帝称臣”。这两则事例说明,历来被认为是好“黄老刑名之术”的汉文帝,其实是践履着“修齐治平”的路径,将一人之道德,客观化于社会,使其成为政治设施。

(据《河北学刊》)